



TWILIGHT IN MIDNIGHT

林贤治 著

午夜的幽光

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

漓江出版社



TWILIGHT IN MIDNIGHT

林贤治 著

午夜的幽光

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午夜的幽光 / 林贤治 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 - 7 - 5407 - 5298 - 9

I. ①午… II. ①林…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世界 IV. ①D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7988 号

策 划: 郑纳新

责任编辑: 阎海文

装帧设计: 李星星

出版人: 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55087201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960mm × 690mm 1/16

印张: 18 字数: 190 千字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539 - 2925659)

题 记

大约是因为气候的缘故，这几天好像什么事都不能做，只好翻看旧稿。想不到，两三年来在报刊上发表的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文章，居然有了十余万字，于是着手编了起来。断断续续地，及至午夜，手头终于多出了这样一个集子样的东西。

书名采自集内叙说法国思想家薇依的一篇。这位柔弱的女性，不但才智过人，其道德勇气尤其令人景仰。从左拉到薇依，到后来的萨特、加缪、福柯，他们的行动自外于权力，或者简直就是挑战权力，明显地具有一种个人的或团队的英雄主义，形成为与俄国知识分子同一底色，而又独具法兰西特色的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谱系。不同于经院知识分子的是，他们耻于做知识学的炼金术士，而争当大众社会的燃灯者和拓荒人。

《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六篇曾在《随笔》杂志连载，后因故移至《东方文化》杂志刊完。全篇泛泛而谈，卑之无甚高论，唯脉络尚算清晰，重心仍在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结论则有点失败主义的味道，应当不足取的。其余论及西方知识分子的篇什，都属个案分析。回过头看，好像这些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人物都带上某种类似的特点，即反强权、反体制、反潮流，以及平民主义的立场。他们缺乏中国知识分子的温顺、折中、机变——来源于儒家文化和本土政治经验的东西；为了真理和正义，往往喜欢走极端，“全有或全无”。那种挑战反抗，争天拒

俗的精神，在我们看来，确实是很可惊异的。有学者说，这同他们的宗教文化大有关系，是耶非耶，却很难说。但如果有人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基础上，做一部知识分子精神史，倒是很有意思的事。

中国知识分子方面涉及两个人，其一是鲁迅。对于鲁迅，我以为，他是中国的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标志就是与权势集团相对立，而致力于阻拒国家对人——现实中的弱势群体及生命个体——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剥夺，而且，自始至终，坚持个人的自由实践，体现了作为一名叛逆的精神战士的思想与行动的一致性。关于鲁迅的争论早已展开（至九十年代，随同“告别革命”论的勃兴，崇胡适而贬鲁迅的论调大行其道），离结束之日尚远。有一点明白无误的是，鲁迅存在的意义，唯有在对身为类存在者的社会身份——从奴隶（这是鲁迅常用的词）到公民到世界公民——有了充分的认识之后，才有可能作出较为准确的阐释。

另一位是李慎之。同胡适一样，李慎之亦兼具学者和官员的双重角色，而且两人都喜欢做“王者师”。好在他还有做“公民教师”的意愿，并身体力行，致力于现代价值观念的普及工作，“不知老之将至”；关键时刻，余勇可贾，都很教人佩服。但是，他从宪政问题那里引出否定革命的结论，我是明确表示反对的。戏剧性的是，他启蒙的“西学”内容并未达致人们的共识，而类似的“告别革命”论，自九十年代初开始，却已日渐成为中国思想学术界的主流。

据说公正的时间可以验证一切，其实未必尽然；若然，就不会有如“永劫不复”一类说法。而今借了整理旧稿的机会，重睹其中这些知识分子及其思想的命运，难免生出许多感慨。这期间，升降浮沉，兴衰成败，何尝有什么定论呢！

2004年6月3日

目 录

题记

1	
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	
73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	
101	
对称：在纳粹的阴影下	
108	
在奈保尔与萨义德之间	
113	
萨义德：丧失之痛	
117	
奥威尔：政治、艺术与自由	
123	
奥威尔：书的命运	
129	
为宽容而斗争	
135	
后奥斯卡写作	
148	
米沃什的根	
154	
包围凯尔泰斯	

161	
穿粗布衫的和穿燕尾服的终究要分手	
171	
盗版与地下印刷	
180	
法布尔与他的昆虫共和国	
184	
性、群众、法西斯	
193	
《现代性与大屠杀》	
199	
有一种书用道义书写	
204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213	
三部书	
220	
鲁迅：反抗者的精神文本	
250	
《人间鲁迅》修订版后记	
255	
纪念李慎之先生	
265	
《文学中国》：序言，或一种文学告白	
273	
序《紫地丁文丛》	
275	
序《忍冬花诗丛》	
278	
再版后记	

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

1

知识人

知识是一个元概念，可以由此衍生出一个概念群：知识人、知识分子、知识工业、知识主义、知识社会学，等等。

即如由资本构成企业家、金融家、高利贷者、纨绔子弟和守财奴，由权力构成君王、僭主、政客、弄臣、革命者一样，由知识组成的知识人，除了共同使用的知识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相关性之外，作为一大族群，其中的人物可以很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在知识社会中，由于知识人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特定的社会圈子的依赖程度不同，与圈子内外相联系的对象和方式不同，因而所受社会组织结构所施加的压力也各不相同；知识人对社会，从霸权直到其余触目的事物和事件，便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态度，“内战”于是发生。

社会斗争往往通过知识人的内战进行。

只要知识人存在一天，内战不会停止。

《知识分子的背叛》
封面。朱里安·本达
(Julien Benda, 1867—
1956), 法国政治和
社会哲学家、散文家。
一生撰写了大约 50 本书,
大多属于文学和社会评论
方面, 其中以《知识
分子的背叛》最为
著名。



被称为波兰和美国社会学之父的兹纳涅茨基在其名著《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中, 试图建立知识人所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的类型学。他将有关的角色分为四大类型: 技术专家、圣哲、学者、知识创造者。这样的划分未必是准确的, 事实上, 在知识社会学领域, 也仍然有着形形色色的分类方案; 但是, 兹纳涅茨基关于知识人参与的特定角

色系统所作的发生学及功能的阐述, 无疑具有启发的意义。特别是角色转移问题。角色是一个动态系统, 在执行过程中, 角色成分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相互纠缠在一起。可以是单个角色, 也可以是多重角色, 还可以变色龙般地变换角色。对于角色执行者而言, 根据其主观意向, 可以有多种方式去执行角色; 或者, 只对角色成分诸如社会圈子、自我、地位、功能等其中一种感兴趣, 而使其余的从属于它。由此, 在知识人中就有了“守夜者”, 有了“异类”, 有了如法国评论家本达所称的“背叛”问题。

知识阶级

五四时期称“知识阶级”(源于日语), 后来在政治家的著作中变做了“知识阶层”, 阶层只是阶级的一部分, 意在强调其依附性。再后来, 连“阶层”也搁了起来, 单说“分子”, 很明显属于游离的社会角色。其实, 作为一个外来名词, 就语义学的意义上说, 知识阶级、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一个词 (intelligentsia)。

多少波澜险恶, 唯在几个方块字的摆布之间。

从知识人到知识分子, 中间多出一个精神过渡的层次。现

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虽然可以导源于古希腊的哲学家或中世纪的教士，但是，如果脱离了法国大革命以降的一系列崭新的文化理念和近代科学关于世界构成的观念的影响，要产生根本性的蜕变是不可能的。

由自由、民主、科学凝聚而成的知识分子精神，成了知识分子的标志。

“知识阶级”作为一个名词，据考证，最早源于俄国，大约1860年间已经出现，甚至还可上溯至18世纪。而作为现代意义的词，在法国，则在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之后，由法国政治家、激进派领袖、第三共和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于1898年1月14日在《文学·艺术·社会晨报》上发表《知识分子宣言》时首次使用。可见，从诞生之日起，“知识阶级”已是遍身烈焰，放射出社会正义的光辉。

俄国知识分子是特异的一群。

所谓特异，是因为他们把知识分子精神发挥得特别充分。领队者之一的赫尔岑，赞许他的兄弟兼具法兰西和德意志的美质，他们肩负着把他们的“北方货币”投入人类思想宝库的伟大使命，是“很少生活于往日的人们”，是“统一科学和生活、言论和行动的代表人物”。英国俄裔思想家伯林称他们是一支自觉的军队，他们的存在，将对世界知识者的良心构成永久性的冲击。关于俄国知识分子，以色列学者康菲诺列举了五项特征：一、关怀社会；二、把公共事业视同个人责任；三、倾向于把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四、

赫尔岑（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анорович Терцен, 1812—1870），俄国思想家，作家。生于大贵族家庭。少时深受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影响，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时，组织成立宣传革命思想的小组，后被捕流放。流放归来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847年被迫出国，寓居巴黎。1853年在伦敦建立“自由俄国印刷所”，又创办《北极星》文艺丛刊及《钟声》报，号召人民推翻国内专制制度。著有哲学著作《科学的一知半解》、《自然研究通信》、小说《谁之罪》，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等。英国学者伯林在著作中对他十分推崇。



以赛亚·伯林
(Isaiah Berlin, 1909—1997), 英国哲学家和思想史家。出生于拉脱维亚的里加, 1920年迁居英格兰。曾在英国情报部及大使馆供职, 1946年被授予C.B.E英帝国高级勋位爵士。1933年起, 在多所大学任教; 1957年任英国科学院研究员, 1974年任院长; 1963年任亚里士多德学会会长。著有《卡尔·马克思》、《维柯和赫德尔: 思想史的两种研究》、《俄国思想家》、《自由四论》等。



安东尼奥·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1891—1937), 意大利政治哲学家。早年同意大利社会党建立联系, 为社会党党报《人民之声》及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的撰稿人, 后来组建共产党, 并成为重要的领袖, 1926年在罗马被捕。著有《狱中札记》等。他对阶级、政党、国家以及知识分子的论述极富于创造性, 被称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先驱者之一。



义务感; 五、深信事物的不合理, 以及加以改造的必要性。此间, 贯穿了俄国知识分子对于俄罗斯土地的燃烧般的情感。乌斯宾斯基把提升起来的涵盖这一切的精神称作“土地——人民性”, 其实这就是俄罗斯精神。索洛维约夫们的“新精神哲学”, 车尔尼雪夫斯基们的斗争哲学, 也都是紧贴着那黑油油、潮乎乎的土地飞翔的。

鲁迅说中国没有俄国式的知识分子, 就是说中国的知识界缺少知识分子精神。

有机性与无根性

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对知识分子有一个经典的两分法, 就是“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他是从形成不同的知识分子范畴的历史过程所采用的形式, 其中主要是两种形式的对照分析中得出这个创造性的结论的。

社会集团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 这样的阶层不仅在经济领域, 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将同质性以及对自身功用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 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是有机知识分子。一般而言, 他们是伴随着新阶级的出现而活跃在由新阶级所力图彰显的新型社会中的“专业人员”。他们是忠实于新阶级和新社会的。传统知识分子则通过“行会精神”, 感受到自

已不间断的历史连续性和自身的特性，因此自认为是自治的，独立的，无须依靠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但不论有机或是无根，正如美国著名的文化批评家萨义德所说：“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孤寂与结盟之间”。

葛兰西说，所有的人都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但是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

如何通过特定的条件和特定的社会关系实施知识分子职能，成了问题的关键。在葛兰西看来，有机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代理人，是上层建筑体系中的公务员；其有机性，是由行使社会霸权和政治统治的下级职能来体现的。

从意大利，到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美国、中南美，以及中国、印度、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知识分子的比较性描述，是《狱中札记》中饶有意味的部分。

意大利及法国知识分子的国际性或世界性，显然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缺乏，这是基于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经验之上的现象。英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为当权的工业集团所吸收。其他国家也采取同样的缝合方式，其中包括德国。但是，作为德国



鲁迅（1881—1936），中国思想家、文学家，现代启蒙主义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902年留学日本，七年后回国。辛亥革命后，曾在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职，并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授课。1926年8月，南下厦门、广州任大学教职。1927年10月到达上海，专事写作。先后加入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争取自由、人权而斗争，于1936年10月病逝。著有《鲁迅全集》、《鲁迅译文集》等。



萨义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美籍巴勒斯坦学者，文化批评家。生于耶路撒冷，在英国占领期间就读巴勒斯坦和埃及开罗的西方学校，接受英式教育，20世纪50年代赴美国，先后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1963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著有《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知识分子论》等。他强调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批判性、边缘性，并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投身巴勒斯坦政治活动，在世界享有盛誉。

工业家的传统知识分子，却保留着特权以及强烈的独立意识，原因是死而不僵的容克地主拥有自己的经济基础，拥有自己的常备军，以及稳定的组织干部，所以有利于保持集体精神和政治垄断。俄国知识分子中一些精英分子移居国外，吸收了西方最先进国家的文化与历史经验，却未曾丧失自身民族最根本的特征。他们回国之后，不是营造狭小的文化学术圈子，而是强迫人民觉醒。这些精英人物与引进的德国人之间的差别，正在于其本质上的民族 - 大众性。葛兰西指出，这种特性不可能为俄国人民的消极的惰性所吸收，因为它本身就是俄国对其历史惰性的有力的反弹。中国的留学知识分子，相反容易为国民的惰性所吸收，仅此就可以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迅速退潮的一个注脚。不同于美国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匮乏，在古文明国家中，这类的知识分子呈大量积淀状态。葛兰西特别指出，在中国，文字书写是将知识分子同大众分开的表现。在印度和中国，宗教领域也构成了分割知识分子和大众的鸿沟。

葛兰西高度评价俄国知识分子，他认为，俄罗斯的现象可以和美利坚民族的诞生相比拟。盎格鲁 - 撒克逊移民本身就是知识精英，他们移居美国，除了道德力量和意志力之外，还随身带去了某种程度的文明。欧洲历史的某个阶段，一旦经由他们移植到美洲的处女地上，其本质的力量便毫无窒碍地发挥出来，速度是旧大陆所无法比拟的。关于旧大陆，葛兰西认为存在着一系列致命的障碍，不愿消失的旧制度的遗迹；正是它们阻碍了快速的进步，以保存和均衡对待每一种首创精神，而且极力通过时空来冲淡它。类似的障碍和遗迹，在古文明国家中，更是随处可见。

普遍型与特殊型

法国著名学者福柯把知识分子分为普遍的与特殊的两个类型。

福柯说：“普遍型知识分子来自名人——法学家，并且在作家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因为作家掌握着所有人都能从中认识自己的意义和价值。特殊型知识分子则来自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物，此种人物不再是名人——法学家，而是专家——学者。”福柯认为，特殊型知识分子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出现的，象征性的人物是原子物理学家奥本海默，他将普遍型知识分子与特殊型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福柯赞扬他在离开专业领域以后，在美国科学事务中担任了“类似政委的角色”。

福柯指出，这样一个重要时刻已经到来，即：“学者凭借局部科学真理——不管其重要性如何——干预其所处时代的政治斗争。”在西方知识分子史上，他用达尔文取代左拉，作为这一历史转折点的代表；还特别指出，生物学和物理学以特殊的方式成为特殊知识分子这个新角色产生的领域。他认为，技术——科学结构延伸到经济和战略范畴，必然赋予这一新角色以实际重要性。

的确，像生物学和物理学这样的自然学科所内含的科学哲学，与人类社会改造的进程关系密切，或者可以说是具有潜在的革命性。但是，自然科学本身并不具备思想，其潜在价值，唯有凭借人文精神去进行发掘，而不可能自动地作革命化的延伸。



福柯 (Paul-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法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疯狂与文明：古典时代的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知识考古学》、《纪律与惩罚》、《性史》等。福柯的思想以批判性、超越性、多变性著称，在历史学、哲学、文学、社会科学以至医学产生重大影响。法国著名哲学家德勒兹称 20 世纪为“福柯时代”。



奥本海默 (J. Robert Oppenheimer, 1904—1967)，美国物理学家，原子能专家，有美国“原子能之父”之称。当他以科学家的身份反对试制氢弹时，即已介入政治生活，承担了知识分子的责任。

左拉 (Emile Zola, 1840-1902), 法国作家。生于工程师家庭，当过职员。早期作品受浪漫主义影响，后信奉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第二帝国的崩溃和巴黎公社起义促使他关注社会问题，他的小说，也因此倾向于自然主义。1871-1893年间，写出由20部长篇小说构成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其中重要的有《小酒店》、《娜娜》、《萌芽》、《崩溃》等。德雷福斯案发生后，于1898年发表《我控诉》一文，抨击反动当局，为此被判处徒刑，后逃亡英国。



卡尔·曼海姆 (Karl Mannheim, 1893-1947), 德国社会学家。1926-1930年任海德堡大学社会学讲师，1930年开始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和社会学系主任，至1933年被纳粹当局解除职务。1933年到伦敦大学任教，在伦敦去世。著作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自由、权力及民主规划》、《论知识社会学》、《论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论文化社会学》等。



二战期间，原子弹的爆炸在日本造成了巨大的惨剧，由此引发的科学价值的危机，至今仍然使人们惊恐不安。

或许适得其反。作为自然科学家，专业与“社会人”分离，专业往往过滤了社会成分，包括心理学根源而使自身单纯化；而作为作家，或社会科学工作者，其专业融进更多的社会成分，而且始终伴随着情感和生命的冲动，是一个复合体。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家的专业是由来安全的，作家和人文学者的专业却容易构成如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说的“危险的思想”。在纳粹德国，比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无疑遭到更严重的摧残，不驯服的作家和思想家所受的迫害是空前的。“文革”横扫一切，比较言之，自然科学家

至少在名义上受到权力的保护。自然，极少数戏子样的文人也是受到了保护的，因为要歌颂太平。

一言以蔽之，科学无法取代精神。

新阶级

社会学家曼罕说，近代的自由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固定的经济阶级，知识和思想则成为他们唯一的凭借，因此才能坚持自己的“思想上的信念”。

贝尔认为，知识分子早已成为独立阶级而与其他阶级争夺社会控制权，技术知识分子的迅速壮大，将最终导致知识阶级

的统治。古尔德纳随之提出“新阶级”的概念。他认为，随着人类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资本行将代替货币资本；作为文化资本的占有者，知识分子也必将取代原有的资产阶级而成为新的统治阶级。由于新阶级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本身具有某种批判性，故而成为社会整体利益的承载者，成为“普遍阶级”。

很可能这是知识阶级的一厢情愿，就像戏曲中的穷秀才梦见中状元一样。问题不在于权力结构的变化，即使新型的技术官僚代替了老官僚，而统治依然如故。如何废除由推陈出新的权力形式所保护起来的本质性的奴役，是问题的全部。

萨义德否定在“后现代”的时代里，可以放弃通过个人行为以增进人类的自由和知识的目标；认为即使如法国哲学家利奥塔那样一再声称与前现代相关的“解放与启蒙的大叙事”不再流行，他对于知识分子的一贯看法仍然不会改变。

代表性

萨义德承认，知识分子应当而且可以成为“代表性的人物”。

他说：“对我来说，中心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产生）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的议题。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



利奥塔 (Jean-Francois Lyotard, 1924-1998)，法国哲学家，关于后现代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主要著作有《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变异》、《非凡人》、《后现代道德》、《话语，形象》等。

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或无意违犯这些标准的行为。”对于知识分子的代表性，萨义德未免太夸大、太乐观了。事实上，没有任何人或集团可以作为一种人类普遍观念的化身而出现。他所说的代表性，唯是价值观念中的代表、意向中的代表，而不是事实的代表。好在他在关于代表性的言说中，同时强调了个人，活生生的人，包括那独有的怪异、暴戾的人生风格和社会表现。

真正的知识分子一定单纯地只是一个人。

唯有个人能够思考，正如曼海姆所说：“不存在任何诸如群众头脑的形而上学的实体。”

知识分子对谁负责？对什么负责？知识分子同什么相关？法国当代思想家鲍德里亚面对这类提问，坚定地回答说：“我依然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负责。”

在强调知识分子为自己负责时，他回顾了1968年的“五月风暴”，指出风暴过后，人们都说从此再没有人上街为他人代言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中索邦大学墙壁上的著名标语：“同学们，在最后一个资本家被最后一个官僚的肠子绞死之前，人类不能获得幸福！”